

郑永年：革命将至？

2018年1月2日 星期二 03:30 AM 文/郑永年 来自/联合早报

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加速着世界的变化，而变化总是给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。如果一个社会既能获取变动所带来的红利，又能消化变动所带来的负面结果，那变动便是进步；如果一个社会有能力获取变动所带来的红利，却不能消化变动所带来的负面结果，那这个社会就会充满风险；如果一个既不能获取变动所带来的红利，也不能逃避变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，那这个社会就处于险境中了。

从今天世界各国的现状来看，大部分国家似乎都面临后两者情形。这尤其表现在极端的收入分配差异和社会分化方面。尽管很难想象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，但一个社会如果缺失基本的社会平等和公平，那这个社会就会很难治理。历史上，高度分化的社会往往会发生革命甚至动荡。无怪乎，今天为数不少的人越来越担心是否革命再次将至。

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。最近，专注于收集收入和财富分配数据、分析世界不平等现象趋势的世界不平等实验室（The World Inequality Lab）发布了一份题为《世界不平等报告 2018》的报告。包括法国学者皮凯蒂（Thomas Piketty）等诸多著名学者在内的研究团队发现，在 1980 年至 2016 年间，收入前 1% 的人掌握了北美（美国和加拿大）和西欧实际收入总量的 28%，而收入后 50% 的人只得到其中的 9%。

北美和西欧的实际对照更为明显，也更糟糕。在西欧，收入前 1% 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与收入后 51% 的人相当；而在北美，收入前 1% 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与收入后 88% 的人相当。

报告也发现，尽管收入差异扩大是一个世界性大趋势，但各地区和国家则有差异。自 1980 年代以来，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北美和亚洲迅速攀升，在欧洲适度上升，在中东、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巴西则稳定在极高水平。二战后，西方各国收入前 1% 的人的收入占比相对较低，但自二战以来，收入前 1% 的人的收入占比在英语国家大大增加，尤其在美国；而在法国、德国和意大利几乎没有什么变化。

不难看到，收入差异恶化最严重的，也是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。东亚经济体早期在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，也实现了收入差异的最小化，为社会公平的世界典范。但 1990 年代末以来，这些经济体也以不同形式引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，收入差异快速扩大。

联合国的一个美国考察报告也带来了同样不好的消息。该组织的赤贫和人权问题报告员到美国各州考察，发现平均每八个美国人就至少有一个生活贫困，而当中近半则深陷赤贫，绝大部分无法摆脱困境。美国官方数据显示，14%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，但这个考察报告则认为 20%较为接近现实。

这里还有一个就业“假象”问题。尽管美国的失业率不高，但就业并不意味着脱离贫穷。以沃尔玛超市员工为例，一般工人单靠一份全职工作无法生存，除了工作还必须依赖政府发放的票证来支撑生活。今天的美国，出生于贫困中的孩子，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摆脱贫困，穷人家的孩子缺乏或根本就无法吃上对发育有助益的营养食品，难以获得基本卫生保障和教育机会。

政策恶化不平等

同样严峻的是，尽管不平等是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形成的，但很多国家所采取的政策不是去缓解不平等，反而在恶化不平等。以美国为例。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开始采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，在医疗改革等方面向穷人倾斜。但特朗普上台之后，马上中止了奥巴马的政策。不仅如此，特朗普推出新的税收改革，大幅度消减企业税率。普遍估计，这一税改会导致消减社会福利和医药津贴等政策，结果只会使得贫困与不平等变得更加糟糕。

实际上，很多年来，不平等一直是西方社会讨论和争论的最热点问题。这些年，围绕着皮凯蒂所著《二十一世纪资本论》（*Capital in the Twenty-First Century*）一书所展开的激烈争论，就可以窥见一斑。西方学者普遍认为，巨大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，已经开始威胁到西方民主政治。贫困使得穷人越来越边缘化，他们的声音没有机会让人听到，因而无法影响公共政策。

西方传统上是少数人的精英民主，民主意味着少数人的政治参与。但在大众民主时代，所有大众都可以参与政治。不过，前提是大众教育，人们能够理性地获取信息，理性地分析信息，做出理性的选择。贫困者不见得不能参与，但贫困的确影响人们理性地参与政治。贫困状态下的参与，经常导致人们不想看到的结局。这种情况已经发生，最明显地表现在

英国脱欧公投上，公投产生的结果既不是反对公投的中产阶级所想看到的，也不是很多支持公投的人所想看到的结果。

西方发达国家如此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。以中国为例，收入分配实际上已经非常严峻，以至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具有政治敏感性，经常被禁止讨论。不看别的，光看如此之小的中产阶级规模，就可以从侧面看出巨大的收入差异。

在东亚，日本和亚洲“四小龙”经济体（韩国、新加坡、香港和台湾）在经济起飞之后的 20 多年间，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。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近 40 年里甚至高于这些经济体，但中产阶级仍然非常小。在西方看来，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消费社会，但这只说明中国中产阶级的绝对人数多这一事实。在中国，高消费社会只是很小的群体，占人口的比率非常小。

和西方一样，经济结构和技术的变化也使得收入差异急剧拉大。尽管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缓解了就业压力，但服务业很多从业人员至多维持在传统所说的生存经济水平。快递、出租车、保安、房地产建筑和其他服务业领域的大量就业人员，能够生存就不错了，根本不会有条件跻身中产阶级。以快递业为例，阿里巴巴等几乎所有快递公司，都是以拼命压低快递小哥的工资来获取利润。资本方的获利水平和普通快递小哥的工资差异巨大。

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挑战

为什么收入差异很难得到有意义的改善？一般认为，这主要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。在既得利益集团牢不可破的情况下，富者越富、贫者越贫。这其实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逊（Mancur Olson）的命题。奥尔逊在《国家的兴衰》（*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*）一书中，深入探讨了既得利益集团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。尽管奥尔逊探讨的是经济增长问题，但他的理论对解释收入差异扩大也是有效的。

奥尔逊认为，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必然形成既得利益集团，而既得利益则是分利集团，他们置其他群体的利益于不顾，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。每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都会致力于努力分到最大一块经济“大饼”，把发展转变为分配，从而阻碍经济增长。奥尔逊更观察到，一个社会战争或动乱之后，经济增长会比较快，因为战争和动乱削弱既得利益集团。

收入分配方面何尝不是这样呢？既得利益往往就是“自我服务”集团。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二次分配政策上，既得利益所制定的政策都是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。他们的政策尽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穷人受惠，但大部分利益则流向既得利益本身，从而加大收入差异。

从历史角度来看，似乎并不存在有效解决巨大收入差异的方法。不过，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是很难生存下去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个问题必须解决。历史提供给人们的方法，或许是人们所不希望看到的，但的确发生了；就是说，有效地解决收入差异问题的往往是灾难，包括战争、革命、瘟疫和饥荒。

瘟疫和饥荒是自然灾害，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人类的控制，而战争与革命则是人为的。其实，战争和革命往往是一个事物的两面。情况往往是因为内部因素而产生革命，统治者为了转嫁内部革命而产生了国家间的战争。例如，一战和二战都和西方国家内部矛盾有关。尽管今天的条件不同了，但战争的风险仍然存在。

这些年来，地缘政治在快速变动，并且与各国（尤其是大国）内部经济形势密切相关。全球化在西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，各国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。尤其在美国，民粹主义、贸易保护主义、经济民族主义急剧上升，并把责任推到其他国家（尤其是中国）身上。在内部矛盾尖锐时，也不能排除一些国家在军事方面的冒险。

解决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方法

就革命来说，历史上出现过三种革命，对减少收入差异、增进社会公平方面发生过重大作用。

第一，西欧式社会主义革命。这是一种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的“革命”。原始资本主义下的高度剥削，促使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。为了资本主义的正常运作，西方政府进行了“自我革命”，通过税收政策进行二次分配，确立了福利社会。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社会，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一次最伟大的转型。如果福利社会是可以持续的，那社会也会稳定下去。当然，今天福利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于其可持续性。

第二，苏联和中国式的暴力革命。暴力革命用最直接的方法消灭了既得利益，实现所有人财物的重新分配，从而大大减少了社会的不平等。不过，很显然，暴力革命中，生命代价的损失不可计数。

第三，日本和亚洲“四小龙”经济体的“社会革命”。这些经济体一方面接受了资本主义来促进经济发展，另一方面接受了前面两种革命的教训，政府主动进行社会建设，既避免了苏联、中国式的暴力革命，也避免了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运动。它们都在经济起飞后的30年时间内，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，实现了社会公平的目标。

今天，很多国家再次面临极端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，都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前面所说的美国特朗普减税方法，尽管其意图是为了刺激经济发展，但就解决收入差异来说，并不被看好。欧洲也在寻找方法，一些北欧国家在进行试点，不管人们工作与否，都能得到一份工资。这种方法可以说是传统福利方法的延伸版。中国则在通过精准扶贫，解决农村和城市的绝对贫困人口。不管使用什么方法，如果不能守住穷人最低生活线，那“革命”就会出现。

不过，也很容易看得出，所有这些改革都不是系统性的社会变革，不足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。既得利益主导下的所有改革，其核心仍然是增进既得利益，而非普罗大众。无论是美国或欧洲，只要既得利益所做的仍然是巩固自己的城堡，穷人增加的趋势不可逆转。

此外，今天的穷人也往往是受过教育的群体，并且拥有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有效武器。内外部的任何因素都很容易触发革命的发生。以前西方国家在非西方国家推行“颜色革命”，但现在颜色革命也已经延伸到西方本身。可以相信，如果各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“自我革命”的勇气，那不同形式的革命可能会是不可避免的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